

LISHIXUEJIA DE RENWEN QING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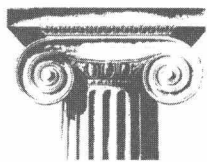
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

——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

张广智 ©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LISHIXUEJIA DE RENWEN QINGHUI

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

——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

张广智 ◎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 / 张广智编.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303-12042-0

I. ① 历… II. ① 张… III. ① 历史学家—思想评论—西方国家 ② 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 K835.058.1 ② K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7511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28.5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策划编辑: 刘东明

责任编辑: 刘东明 于 乐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历史学家与人文情怀（代前言）

——由汤因比说开去

张广智

1921年，秋天。落日的余晖给群山抹上了一层阴翳，巴尔干半岛上起伏的山峦平原，若隐若现，虚无缥缈，悠远而神秘。

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出的东方列车^①上，一位年轻人正伫立在窗畔，出神的向远处凝望：眼下，战乱不息；窗外，满目疮痍。夜幕渐渐降临，他纵览当下，回溯历史，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之中：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何在？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借着车廊内昏暗的灯光，这位年轻人奋笔疾书，写下了这样的一份大纲：

1. 序论
2. 文明的起源
3. 文明的生长
4. 文明的衰落
5. 文明的解体
6. 统一国家

^① 东方列车最早于1883年10月4日开始运行，首创者为比利时人。该列车陈设豪华，其路线由西向东横贯欧洲大陆，运行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法国巴黎之间，全程需五天。20世纪20年代，是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1977年停运。后由意大利威尼斯人复办，则往返于威尼斯与伦敦之间。小说与电影《东方列车上的谋杀案》即以此车为背景。

7. 统一教会
8. 英雄时代
9. 文明在空间的接触
10. 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
11. 文明历史的节奏
12. 西方文明的前景
13. 历史学家的灵感

他是何人？他就是英国人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享誉 20 世纪的历史学家。时值希土战争（1921—1922）鏖战方酣之际，汤因比正以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的身份，在巴尔干各地采访。

的确，汤因比不无史才。上述大纲，就是他日后为之耗尽四十年心血的十二卷本《历史研究》的雏形。当其皇皇之作全部出版时，其构架竟然只更动了个别标题，其余一仍如初。

我们当然惊叹于汤因比那非凡的史才，但更惊叹于他那浓烈的人文主义情怀。本文正是由他说开去，琐议西方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它的历史传统、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一、难以割舍 一以贯之

汤因比早年曾受过良好的西方古典教育，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执教多年，又数次在英国外交部任职，一生经历丰富。由于这样，也由于他的长寿，使他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著述宏富的历史学家。在 20 世纪的西方史家中，既用哲人的眼光，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广泛的探讨，又用叙史的才能，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细致的描述，无疑要首推汤因比了。至于前者，当是指他的十二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在这鸿篇巨制中，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德国人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①，成为“新斯宾格勒派”的“代言人”。至于后者，说的是

^① 所谓“文化形态学”，实际上是把文化（或文明）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他那部以抒情诗般的文笔，向读者展现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大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汤因比著作等身，上面之所以只提及《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两书，其因在于两书是其代表作，一前一后。《历史研究》之要旨，成于20世纪20年代；《人类与大地母亲》写作于1973年，则在汤氏谢世之前的两年。一为思辨，一为叙事，风格迥异，但却充分显示了作为优秀史家的互为补充的两种之长，汤因比因此奠定了他在西方史家中“大师级”的历史地位。

《历史研究》从酝酿、写作与成书，历四十年矣，从《历史研究》至《人类与大地母亲》，汤因比走完了他作为史家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其人其作不可能没有变化，但不变的始终是他书中所透析与发散出来的那难以割舍的和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催人思考，亦感人至深。

对此，试作一点论证。

“文化形态学说”的始作俑者斯宾格勒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文化，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和“最后一幕”，而西方文化亦然，也必然合乎命运地走向自己的归宿。他指出：“有生就有死，有青春就有老境，有生活一般地就有生活的形式和给予它的时限。”^①

作为“新斯宾格勒派”的汤因比也对比作了回应，他在《历史研究》中答曰：

我们虽然在文明过程的分析中发现周期的重复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本身是具有循环性的。相反地，如果我们能够得出任何合理的结论，认为那些次要的运动是有周期性的，那么我们毋宁认为由这些次要运动所体现的主要运动却不是重复的而是发展的。人类并不是永远缚在轮子上的伊克西翁，也不是永远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发士，永远往上推，而又无能为力地看着它滚下来。

对于我们西方文明的子女来说，这正是对于我们的鼓励之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音，我们今天独自挣扎向前，在我们的周围全是一些垂死的文明了。说不定死神把我们的文明也会置之于绝路。但是我们并没有面对任何凶恶的必然。死去的那些文明并不是命中注定必死的，也不是“天生要死的”，所以我们的文明也不是必须同其他多数文明共命运的。虽然据我们所知，有十六个文明已经死了，另有九个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的这个第二十六个文明却不一定非服从命运的安排和统计数字的盲目计算不可。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起来，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①

且不去深论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史学思想之异同，这是仅就上引的这些文字而言，以文明（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并都把它视作有机体的观点，或者是各个文明“价值相等”且可进行比较研究的观点，两者是如出一辙的。但在说到文明发展的进程，尤其是西方文明前景时，两者就分道扬镳了。他们两人都深切关心西方文明的前途，然而，与斯宾格勒的悲观论不同，在汤因比看来，西方文明还有生路，因为“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起来，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

汤因比目睹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弄得满目疮痍的西方社会，他的“使命感”矢志要为西方文明寻求一条“得救之路”，但通观全书，汤因比还是拿不出一套为拯救西方文明而开出的“济世良方”。

不管怎么说，我们从西方这两位史家身上，分明可以看到他们那共同的人文情怀，对世界各个文明进程的求索，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关注。他们不是从国家、民族，而是以人类整体去思考人类，思考世界。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有着淋漓尽致地表露着这种情怀，后者尤甚。

汤因比的人文情怀是一以贯之的，从《新欧洲》（1915）到《文明经受着考验》（1948），从《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1954）到《拯救人类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等译，14～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的未来》（1971），莫不如此。在汤因比晚年的代表作《人类与大地母亲》那里更是如此。这是一部叙事史的长篇，汤氏自称此书“对人类历史作一宏观鸟瞰”^①。他在对人类各个类型的文明逐一描述，以展示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之后，汤因比用凝重的笔调，写下了最后几行文字：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②

由此可见，重视人，关心人类的未来，一直是这位历史学家难以抹去的心头之忧。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难题”。先贤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诘问，我以为在当今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时代意义。

越到晚年，作为史家的汤因比，其人文情怀就越加浓烈，越加深沉。这里不说别的，仅从他在迟暮之年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③摘录一二，就可可见一斑。

汤因比在对话中，首先在回应池田大作说的“人类也是一种动物，并具有种种本能的欲望”这个事实时，说道：

人类是处于这样一种麻烦困惑的境地，他们是动物，同时又

①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② 同上书，735页。

③ 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汤因比与日本宗教家、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伦敦作了两次长谈，后由专人据录音整理成书，分别用英文和日文出版，后又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发行于世界各地。中译本据日文版翻译而成，译者为荀春生等。中文书名为《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

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存在。这就是，人类因为在其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性，并感觉到必须维护它。^①

汤氏之言甚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具有尊严，而后者没有。当然，人有贫富之分，或者贵贱之别，但他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换言之，人的尊严不因富贵而高傲，也不因贫贱而低微。换言之，维护人的尊严，让人能更有尊严地生活着，这应当是人文情怀之要旨。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尽管纵览古今，横贯东西，从宇宙天体到世界大同，从伦理道德到气候变化，天马行空，无不涉及，但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自身及其地位的关切。为此，诸如教育、福利、医疗、人口、节育、死亡、天灾等种种有关人类的话题，无不引起他强烈的兴趣与高度的重视。

前面说到，在汤因比那宏富的著作中充满着从人类整体去思考人类与思考世界的篇章，这种人文情怀也明显地反映在他与池田大作的这次对话中。比如，汤因比确如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样，“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②，特别对中国历史及其在未来世界的作用，作出了超越“欧洲中心论”的评价。^③

汤氏之高论，不再赘引，读者可以翻阅本书的汤因比篇，倘由此再去通览《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那真是东西方这两位学者的幸运了。个人以为，《对话录》当是一本“智者之书”，汤因比也好，池田大作也好，他们的“智者之言”远见卓识而又畅达明快，应当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书中所显现的那深厚的人文情怀。

二、古典教育 史学传统

文化传统具有深厚的力量，尤其当它遇到教育，这种相结合的力量对受教者就更是根深蒂固的了。汤因比正是这样，且看他下述的这段自白：

①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3~4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②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27页，1955年英文版。

③ 参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287~289、291~295页。

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将成为历史学家的人来说，尤其是对出生于那些时代的人来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作为一种基本训练，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有其明显的优点。

我记得，当有一天（那是1913年的一天），我正沿着灰蒙蒙而又不寻常的北海萨弗尔克海滨漫步时，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地中海人，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带着严重的思乡病。1914年的战争正赶上了我向攻读罗马、希腊古典语文的贝利尔学院的大学生讲述修昔底德。当时我的理解上忽然有了一种领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①

由此可知，汤因比自幼就受到西方古典教育的熏陶，潜伏在他的记忆深处，这种深层的记忆“包含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作为的全部模式”^②，自然成了他日后的历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生成的内在基础。

的确，汤因比的历史观，特别是他的人文情怀，受到了西方史学传统的深刻影响。在这里，有必要先说一下关于“人文主义”或“人文情怀”的词义，以引下文。

何谓人文主义^③？给它下定义不是本文的任务，更何况给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词语下定义，真是一件伤透脑筋的事，决不可能像数学上画出一条切线那么容易、那么清晰。但为了行文，我们还需设置“工作定义”，作些宽泛的理解。^④在此，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应当提及。在谈到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看法时，阿伦·布洛克总是持十分谨

①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6、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② 这是弗洛伊德的学生、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关于人的“集体无意识”之论见，参见弗雷·罗恩：《从弗洛伊德到荣格》，陈恢钦译，118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③ 西文 Humanism，中译为“人文主义”，亦可译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

④ 我国学者启良对此作过一些梳理，很可参考。见《西方文化概论》，348～35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慎的态度，不敢贸然给它下定义，他之论见总说是“个人之见”，语气又说是“似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人文主义”确立“边界”，实属不易。这正如论者 F. 席勒在《人本主义研究》一书中所言：“一个真正的定义要恰如其分，确乎牵涉到被定义事物的性质的全面认识。在科学感兴趣的题材之中，有哪一个我们能自诩具有全面的认识呢？”^①

阿伦·布洛克最终还是没有给“人文主义”这模糊不定的概念一个确切的含义，只是从宽泛的意义上对它“最重要和始终不变的特点”作了一点归纳（或者如席勒所说的“临时性的定义”）：

1. 关于人的地位。阿伦·布洛克写道：“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又说，“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做科学研究。”^②

2. 关于人的尊严。他认为：“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③

3. 关于思想。他明确指出人文主义传统“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④。

不管阿伦·布洛克对“人文主义”的上述说法尚有多少缺陷，个人以为，他把“人文主义”聚焦在人、人的尊严和思想这几个层面，对我们理解“人文情怀”还是有启发的。把握阿伦·布洛克的“人文主义”说，又联系与借助上述汤因比书中之论见，我们大体上对“人文情怀”的词义可以略说一二。

关注人，关注人类自身的历史及其未来，这应当是人文情怀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中国，正在寻求人文精神的复归，人文素养的提升，人文创造

① F. C. S. 席勒：《人本主义研究》，麻乔志等译，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②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233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③ 同上书，234 页。

④ 同上书，235 页。

的实现。然而，凡此种种，只有把对人类生存价值和生命的关注，始终放在首位，作为世事的“第一主题”，惟其如此，这种人文情怀才会穿越时空，对接古今，在现时代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为此，需要迫切召唤人文情怀。

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敬畏生命，这是人文情怀的本质特征。因为，维护人的尊严，正如汤因比所言，那是“至高无上”的事情，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也就在这里。否则，人的生命及其意义还从何谈起。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其最终的目的也在于寻求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汤因比的研究成果亦可作如是观。

世界感情，爱的奉献，这是人文情怀的最终归宿。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倘如是，那么这种基于人类的普遍之爱，就演化为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世界感情”，对此，汤因比曾寄托于“世界宗教”^①的助力。不知能否如他所言，由此就能触摸到历史深处的温暖、感悟到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的境界，且拭目以待吧。

还是回到正题。上面说到汤因比深受影响的史学传统，源于西方古典史学^②，尤其是它的希腊史学阶段。西方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古希腊史学留给后世丰硕的史学遗产，其中尤以“求真”与“人文”（或“人本”）最为典型，这里据题旨只说后者。

古希腊关于人的学说是颇为出色的，有论者说道：“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③“认识你自己”德尔菲神庙入口处刻着的这句箴言，再明白不过地向世人昭示，古希腊人对自身问题是何等地重视。从遥远年代的神话传说，从《荷马史诗》，从《田功农时》，从爱奥尼亚哲学家，直至公元前5

① 汤因比曾说过：“通过宗教方面的革命，使人的思想感情急剧地广泛地发生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参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306页。

② 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界定，这里主要指的是古代希腊罗马史学。

③ 安·邦纳：《希腊文明》，第1卷，转引自《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世纪希罗多德，都可窥见古希腊人关于人的最初思考。

希罗多德撰写成《历史》，标志着西方古典史学的莫立，也正是由于他的贡献，古希腊人把人的地位与思考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诚然，希罗多德书中还不时显现神示、征兆、应验等，但揭开其纱幕，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人和人的力量：希波战争。古希腊的一些弹丸之邦结为一体，终于击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它告诉人们，拯救希腊的是人而非神，这也正是希罗多德《历史》所要表述的主题。

至修昔底德，不仅古希腊史学大踏步向前，而且关于人的观念，即重视人、重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更为史家所注目。“人是第一重要的”^①这正是修昔底德在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所要表述的主要理念。他常以悲天悯人的笔调记叙战争所带给人们的巨大苦难，对人类处境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无不充溢着强烈的人文情怀。

古罗马史学继承与发扬了古希腊史学，其人文传统亦然，正如柯林武德所言，希腊罗马史学作为一个整体，它的特征之一是人文主义的，“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标、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②。公元5世纪，由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史观颠覆与改造了古典史学，古典史学中的人的观念被神的观念所取代。14世纪以降，西方发生了文艺复兴，开始走出中世纪史学，又一次“重新定向”，那时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日渐摆脱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复兴了古典史学的“人文观念”，史学“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③总之，在经过了改铸之后，便以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史学而高扬在西方史学发展的舞台上。

自此开始，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因时代与社会的嬗变，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重视人、重视人的命运和人类社会的前途，一直在近现代西方历史学家的文脉中流动，从马基雅维里到伏尔泰，从兰克到布罗代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②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③ 同上书，99页。

尔，迄未中断，也不可能泯灭。

由此可知，汤因比的人文情怀，渊源于他的教育背景、追溯于西方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倘由此寻踪，近现代西方历史学家们的人文情怀，也莫不如此。当然，这种人文情怀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那里，其表露程度与形式不尽相同，或如巨川入海，汹涌澎湃，或如冰下溪流，淙淙汨汨，总之，或直接或间接，或彰或隐，但那散发出来的人文情怀，我们还是能深切感受得到的。即便是他们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河山之恋”或“民族情结”什么的，也不难从中发现蕴藏在他们心灵深处的人文情怀。不是吗？读者诸君不妨读一下本书所选诸家散文后，便不难找到这个答案。

三、历史思维 现实意义

读着近现代西方历史学家的散文，感受他们直逼你心底的人文情怀，浑金璞玉，文情并茂，美不胜收。不过，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感谢汤因比，感谢这位被世人称之为具有“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学家。

因为汤因比，他让我们重温过去。沿着历史的轨迹，我们就蓦然发现，世界历史，古今上下，绵延不绝，从愚昧走向知性，从野蛮走向文明，不畏艰难，百折不挠，铸就了璀璨的现代文明。我们由此，领悟了历史，人类总是不断地向着光明、向着幸福的道路前进，谁也阻挡不了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进程。

因为汤因比，他让我们面对现实。环顾全球，展望当下，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贫富分化、恐怖活动等词语，也许可以缀合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不觉让人徒增忧虑，试问：今日之世界，究竟何处去？奔走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啊，是不是也应该放慢脚步，回看一下自己的足印，去抚慰那躁动不安的心灵。

因为汤因比，他让我们思考未来。人类历史，世代相继，生生不息，但总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世界里度过的，我们与记忆相伴，与反思为伍，从而无所畏惧地迎接来自现实的挑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种愿景，鼓舞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行。

当然，我们不仅只感谢汤因比，还应该对入选本书的（还有大量未入

选的)西方历史学家行注目礼,读着他们的华文,是一种愉悦和审美享受,是一种心灵感应和精神洗礼,不啻在进行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从与他们的对话里,我们感悟历史,解读文化,从而寻求到了人生的真谛。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或者是读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管怎么说,他们所言,事实上是对世人发出的一次又一次的共同的人文召唤。

感谢历史学家,感谢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倘以近现代西方历史学家,尤以汤因比为个案,由此说开去,我以为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具有一般人所不能言及的显著特征,其“情”浓郁,其“怀”深沉,凸显“人文”之光芒,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历史学家,在他们思想中含有强烈的历史思维,而不同于一般人所有的历史意识。

一般来说,历史意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萌生的。在西方,在前希罗多德时代,无论是神话还是史诗,还是“史话家”的记录,其实就含有“历史的”因素,包含有人类(古人)最初的历史意识,但它毕竟是朴素的和稚拙的。那么现代人如何呢?且举现代美国史家卡尔·贝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名篇”,在这篇流传很广的文章^①中,他明确地指出了专业历史学家与其文中所举例的那位“普通先生”的区别,后者不过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意识依然是稚拙的,尽管他是现代人,然而这位现代的“普通先生”也只限于个人的实际生活的经验,但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就要深刻得多,则要超出个人的生活经验本身,致力于史实真伪之考辨,并进而写出真实可靠的历史。换言之,在贝克看来,历史学家“不是去重复过去,而是利用过去,去把普通人对于过去实在发生的事件所加上的那种神话式的改作,予以纠正和合理化”^②。因此,一般人所具有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是不尽相同的。^③事实上,近现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思维,不仅包含有合

① 卡尔·贝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258~2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② 同上书,276页。

③ 关于一般人的历史意识与史家的历史思维之区别,参见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154~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乎科学与理性的诉求，而且其主要取向是人文主义的，因为反思人及人的生成运动，当是历史学家历史思维的题中之义。可以说，历史思维的人文主义取向，这应是历史学家人文情怀之浓郁与深沉的理论依据。

在当今中国，倡导与培养人文情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当代中国历史晚近三十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既解放了生产力，又解放了人，因此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愈来愈深入人心，正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取向，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人文情怀的孕育伴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更成了集体的呼唤和时代的强音：

让关注人、人的命运和人的尊严，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准则和共同诉求；

让维护公平、正义和道德的阳光普照神州大地；

让学习知识、科学和文化之风吹拂到每个个体生命的心田。

因此，在大力推进现代化事业、奔向小康社会的华夏儿女们，是多么迫切需要和培养每个国民的人文情怀。须知，一个民族不能遗忘历史，不能冷漠人文，但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现代社会中世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在解构与质疑声中令人担忧。人们不禁要问：路在何方？“路在何方”，这是现代文明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在这里，历史学家不是万能的，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以为，恰恰相反，在遗忘与冷漠的隐痛与失望中，现时代历史学家将大有“用武之地”，倘充分发挥历史学自身所蕴涵的人文特性^①，借助历史学家的历史智慧，虽说不上可以据此指点江山，但至少在它们遇到“遗忘”、邂逅“冷漠”时，也许会撞击出闪亮而明澈的思想火花，昭示世人，启人心智，从而有助于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不信吗？倘以本文的汤因比之论见证之，然也；以本书所选的西方历史学家散文证之，亦然也。

^① 有论者认为，“历史学的根本特性是人文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对人自身的关注，包括关注人的物质生活、人际关系、思想境界和感情因素等，因而其方法主要便于表现其人文特征。”参见李勇：《保卫历史学》，46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目 录

历史学家与人文情怀（代前言） 张广智 1

共和遗梦 马基雅维里 1

太子的历史读本 鲍修哀 14

论趣味 孟德斯鸠 23

崇拜者布满全欧 伏尔泰 46

随浮云掠过 吉本 63

历史的舞台 黑格尔 73

心灵的解放 基佐 84

诗性精神 卡莱尔 95

“无色彩”的历史？ 兰克 106

自然风物速写（四则） 米什莱 117

恺撒：创造性的天才 蒙森 130

世界历史上的幸和不幸 布克哈特 139

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丹纳 157

边疆说 特纳 174

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背景 迈纳克 185

这个时代的最大难题 鲁滨逊 191

英雄梦 赫伊津哈 198

我的中国观 罗素 207

文明史的做法 比尔德 217

克丽奥：一位缪斯 屈维廉 225

情系莱茵河 费弗尔 236

在黄昏的时候…… 斯宾格勒 249

《宽容》序言 房龙 255